

祥瑞灾异：对史书记载自然现象及背后天人感应学说的思考

——以《左传》为例

牟庆康

云南大学 云南昆明 650021

摘要：史书所记载的祥瑞灾异现象并不仅仅表示一种单纯的自然现象，而是有着其特定的政治功能与文化内涵。它是史书编撰者在其撰史意图的指导下，对存在的相关史料进行有意甄选、去取、加工，并使其所写与自己撰史意图相统一的产物。祥瑞灾异现象虽然直接构建在史书编撰者笔下充满主观意识的历史文本之上，但这却是古人在已有认知范围内寻求的一种合理解释与精神寄托，从而建立起人和自然沟通的渠道。关于祥瑞灾异的思想、学说、制度、信仰，也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活动的主观环境，它也暗含了国家统治、社会秩序、百姓信仰、历史书写者史观等众多因素的价值标准和评判尺度。

关键词：祥瑞灾异；天人感应；《左传》

1. 祥瑞灾异：特定的政治功能与文化内涵

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祥瑞灾异常被用于象征国家政治前途和命运吉凶的两类征兆。祥瑞，在《辞源》中意为“吉祥符瑞”，被儒学认为是表达天意、对人有益的自然现象，同时也是国祚兴盛、社会富足、天下太平的征验与吉兆。而《现代汉语词典》对灾异的解释则是“自然灾害或某些异常的自然现象”，从事件的性质上划分，灾主要指具有破坏性的自然灾害，而异主要指特殊的自然现象。

祥瑞灾异的政治功能主要有三：其一，对臣子而言，有宣扬君子德政和谴责人君之用；其二，对君主而言，有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渲染政绩和维护帝王权威之用；其三，对一个王朝和政权而言，在政权转换、王朝更替的合法性塑造方面同样也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功能。

而经史书编撰者主观建构后的祥瑞灾异内涵和实际政治功能被王朝吸纳以后，对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影响深远。其一，围绕祥瑞灾异建立了一系列政治礼仪制度。比如设立灾异观测、占候、奏报和记录的专职机构与专业职官，为应对灾异而下诏罪己、策免三公、大赦改元、求言举士等。其二，君臣往往因祥瑞灾异调整政策或个人的政治行动，并利用其进行政治斗争与权利争夺。从天子后妃、宰辅大臣到地方官吏、平民百姓，不论是否相信灾异与人事的联系，都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总之，关于祥瑞灾异的思想、学说、制度、信仰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活动的主观环境，也成为了政治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为研究视角，有助于对祥瑞灾异这种中国古代特殊的政治文化符号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

2. 天人感应：史书的春秋笔法与微言大义

史书《左传》中有着大量对灾异现象的记载，例如《〈左传〉中的灾异研究》就考证出《左传》记载的灾异现象共158处。因此，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其一，史书中出现了哪些灾异，可以归纳为哪些表现形式？其二灾异的功能及其实际的影响有哪些？其三、为什么异象和灾难间具有特殊的联系，其背后是怎样的思维方式？通过对文本内容灾异现象的归纳，我们可以对上述问题有一个简要分析与解答。

首先，《左传》中的灾异形式复杂且互相关联，可以简单归纳为以下四类：

其一，常见的自然灾害，例如气象异常、洪水旱灾、虫灾地震等，且其记载多与人事相关联。“夏，大旱，公欲焚巫尪。”天下发生旱灾，鲁僖公认为后者的来源是巫师和骨骼弯曲不正的人，因而主张焚杀他们。另一些常见的自然灾害如地震也常出现。“八月丁酉，南宫极震。”昭公二十三年，王子朝的党羽南宫极死于地震，莒弘以西周灭亡时的地震为例，说明上天已经抛弃西王，而刘文公大有可图。

其二，特殊的天文现象，例如日食、陨星等，且多与政治灾难相对应。《左传》中有数十次日食的记载，例如“十六

年春，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史书记载僖公十六年出现陨石掉落的现象，叔兴虽然对宋襄公说它们是鲁国丧事和齐国内乱的征兆，却又告诉别人这与人事的吉凶无涉，不仅表现这一现象多与国家政治命运联系，还说明国君是此类预言重要的接受对象。

其三，反常的动物行为，同样多与人事相关联。“射之，豕人立而啼。”庄公八年，齐襄公在贝丘打猎时遇到了状似公子彭生的猪，被箭射中后像人一样直立啼叫。而其回来不久，就被刺客所杀。

其四，人的宿命、预言与梦境。“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隐公元年和闵公二年分别有新出生的婴儿手掌心写有字的记载。“韩厥梦子舆谓己曰：‘旦辟左右。’”“吕錡梦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则是两个以梦预见战争的重要例子。史书通过记载人的宿命、预言与梦境从而达到政治或道德的规范作用。

其次，春秋时期人们对灾异的预言和阐释其主要作用有三：

其一，借此预言人的命运。“初，昭王有疾。卜曰：‘河为祟。’王弗祭。”哀公六年楚昭王抱恙，大夫认为黄河神是昭王疾病的来源并主张在郊外祭祀。

其二，借此预言国家的治乱存亡和战争的胜负结果。“冬，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其在这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其三，灾异的实际作用还表现在成为群臣表达政见的途径。“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昭公七年晋平公询问《诗》中“彼日而食，于何不臧”的含义，士文伯在说明政事不善就要蒙受灾祸的同时，给出了选拔贤人、依靠百姓和顺从时令的建议。

最后，《左传》灾异记载的背后其实是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政治贵族认识世界的方式。其主要的文化背景可以被概括为以下三种：

其一，星占气占理论与分野学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昭公十七年有彗星在大辰星边出现，西面到达银河。申须认为彗星具有除旧布新的作用，而当大火星再次出现时意味着诸侯将有火灾。梓慎则认为火灾将发生在宋、卫、郑、陈四个国家，其运用的就是分野理论。

其二，阴阳观与五行观。“夏四月，陈灾。”昭公九

年陈国发生火灾，郑国数术家裨灶就借助了五行关系，认为陈国将在五年后重新受封，再过五十二年灭亡。

其三，梦境与现实的对应和名与实的关系。《左传》中梦境与现实的对应在成公十年有深刻的体现。“晋侯梦大厉。”从晋景公梦见厉鬼索命起，三个预言互相嵌套，两处象征变成了现实。事实上，由于强大的可解释性，梦也是春秋时期占卜的重要内容。《左传》中对于梦的记载虽然手法相近，但载梦、占梦主体多样，内涵丰富，也使其超越一般灾异而成为沟通世俗价值和绝对精神的桥梁。

《左传》中对灾异的记载一方面反映了知识水平相对落后的古人试图理解“天人关系”的努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春秋时期人们思维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具有真实的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力。这些记载的祥瑞灾异现象，或许是真实发生，或许未完全发生，也或许从未发生，但其背后所暗含历史书写的春秋笔法和微言大义既包含当时政治权利象征化与符号化表达，也蕴含着封建王朝历史解释话语权的争夺，因此现代学者不能简简单单的就将其扣上不真实、不科学的“大帽子”，并将其打入伪科学主义的“冷宫”。

3. 天灾德行：人与自然的解释机制与构建框架

张轲风认为：“在上古时期人类原始能力水平较低的阶段，人类无法用武器工具和文明智慧将其治服和驯化，人类族群的自然崇拜之虎崇拜，虎图腾皆是人类被虎的神性“驯化”的表现。“虎患如此，史书所记载的自然灾害亦是如此。

古代始先民面对未知、陌生且对自身生存具有潜在威胁的对象有三：其一为自然环境中雨、雷、雪等自然现象灾害；其二为虎、狼、豹、熊等凶猛野兽威胁；其三为争夺水源、食物等资源而与其他部族发生战争的生存压力。出于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先民需要对自然现象做出吉凶预测并指导其日常事务，然而以当时人们对世界的客观认识和智力水平无法解释这一现象，所以人类文明虽想用积极应对的姿态选择与面对问题，却也是常常面临绞尽脑汁却又无果的尴尬结果，内心也在无形中造就了焦急心态，因而人类会更加努力在自身已有的认知范围内寻求一种合理解释和找到一种精神寄托，从而来建立起人和自然的沟通渠道，于是天人感应“天灾-德行”因果关系出现了。这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也是人类寻求心里慰藉，解释世界的心理需要。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最初依据自然现象预测吉凶的方式逐渐被赋予了天和神道的色彩，并成为君主统治正统性与

法理性的来源。至两汉时期，祥瑞灾异思想则完成了系统性理论框架与解释建构，逐渐发展成为完整的政治哲学与思想体系。

不仅东方有记载自然灾害的史籍，例如西方《圣经》十灾中的冰雹灾、蝗灾，书中对于灾难的想象性修辞，同样也可以理解为人类文明对于自身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解释机制与构建框架，这种方式虽然没有直接地推动人们对于天灾的认识与了解，也并没有获得科学合理的解释，却完善了人类与自然的和解姿态与沟通方式，从而在每次天启暗喻，天降神谕后，人们努力去寻求造成这一现象的动机与原因，从而进行自我反省、反思，从天灾联系德性，从自然联系人事，去积极应对与回答天灾人祸为何发生的质问，并得到符合撰史者史观，君主统治、王朝政治需要、适应民众集体记忆、社会公共记忆的合理解释。

4. 辩证否定：合理的祥瑞灾异与天人感应

克罗齐曾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我们今天看起来荒诞不经的祥瑞灾异思想则是当时那个历史时代视为最正统、最合理、最普遍的思维认知与解释方式，而这种思想也统治着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因此，

我们若以长时段的研究方式来重新审视古代史籍中的“符瑞志”与“五行志”部分及其所记载的祥瑞灾异现象，既认识到在当时历史环境下其产生、存在、发展的合理因素，把握其对封建王朝和底层民众所产生的政治作用和历史影响，认识到其所包含的历史资料价值与政治、哲学、文化智慧，对其进行认真的发掘和研究，同时也要对史书里祥瑞灾异现象中的神秘性和虚妄性有所批判，这样才能对祥瑞灾异这种特殊的政治文化符号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也有助于把握与认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与历史发展的脉络。

参考文献

- [1] 王崇任. 论《左传》志怪篇章的艺术特色 [J]. 商洛学院学报, 2014(01): 28-32.
- [2] 李晓梅. 战国至东汉时期祥瑞灾异说的演变 [J]. 陇东学院学报, 2017(04): 31-35.

作者简介：

牟庆康，2004年5月生，男，汉族，山东人，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历史系本科生。